

【一般论文】

实践跨界主体：试论庄华兴的马华文学论述与翻译

Practicing Transcultural Subjectivity: An Analysis of Chong Fah Hing's Scholarship o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 Translation Praxis

苏颖欣*（澳洲国立大学）

吴小保**（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Show Ying Xi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ustralia

Goh Siew Poh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Malaysia

Email: yingxin.show@anu.edu.au, gohsiewpoh@yahoo.com.sg

Received: 30 APRIL 2024; Accepted: 1 JUNE 2024; Published: 31 JULY 2024

To cite this article (APA): Show, Y. X., & Goh, S. P. (2024). 实践跨界主体：试论庄华兴的马华文学论述与翻译: Practicing Transcultural Subjectivity: An Analysis of Chong Fah Hing's Scholarship o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 Translation Praxis. *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 5(1), 89–118.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5.1.5.2024>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5.1.5.2024>

摘要

本文初步梳理近20年来庄华兴在马华文学与文化课题上的学术论述和翻译实践，探讨其思想来源和研究取径，及其之于马华文学研究的意义。“主体性”这个关键词持续出现在庄华兴的研究著述中，惟主体并非不言自明，也不单纯以本质主义的型态构成。本文认为，庄华兴以“跨界主体”为核心，寻求为“马华问题”解套的方法，同时也彰显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在民族、语言和文化身分归属难题上的深切关怀。本文集中讨论庄华兴论述与实践的两个面向：“左翼马华”和“翻译马华”。庄华兴将左翼视为被压抑的社会运动和文学思想，追溯具有跨国意识的左翼精神。另一方面，他以跨语主义为方法，实际从事翻译工作并寻思翻

* 澳洲国立大学文化、历史暨语言学院讲师

**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译的政治功能，以突破马来西亚国家文化建制的藩篱。两者可说是庄华兴对“马华问题”的响应方式，也展现其期许建立理想的“马华民族”跨界主体的途径。

关键词：庄华兴、马华文学、马华民族、左翼马华、翻译马华、华马翻译

Abstract

This paper combs through Chong Fah Hing's academic scholarship and translation practices of Malaysian Chinese (Mahua) literature and culture over the past 20 years. It explores the sources of his thoughts, research approache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work to the study of Mahua literature. The keyword “subjectivity” (*zhuti xing*) continuously appears in Chong's writings, though the “subject” is not self-evident. This paper posits that Chong Fah Hing centers on the concept of the “transcultural subjectivity” to seek solutions to the “Mahua problems”. His thought and practice also demonstrate the deep concern of Third World intellectuals regarding the problems of national,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e paper focuses on two aspects of Chong's scholarship and practice: left-wing thoughts and translation. On one hand, Chong views the left-wing as a repressed social movement and literary thought in Malaysia, tracing the trans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the left-wing spirit. On the other hand, in his translation work, he practices translational approaches and considers the political functions of translation, aiming to break through the barriers created by the Malaysian state cultural establishments. Both can be seen as Chong's responses to the Mahua problems, and they also demonstrate his aspiration to establish an ideal transcultural “Mahua *minzu*” subjectivity.

Keywords: Chong Fah Hing, Malaysian Chinese (Mahua) literature, *minzu*, left-wing, translation, Chinese-Malay translation

一、前言：从“马华问题”出发

庄华兴教授多年来任教于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直到 2022 年退休，研究和翻译著作等身。他的研究范畴包括马华文学、马来文学、华马比较研究和华人历史文化，是如今少数以华马双语进行论文写作，并在双语学界都引起回响的学者。他也是孜孜不倦的译者，从事难度不小的华语—马来语双向文学翻译工作。文学翻译可谓翻译文体中最具挑战性的文类，庄的译介不仅在多语马来西亚建立语言的桥梁，在文化、思想和美学上促成欣赏和理解，也是挑战国家文学排他性的行动。在社会实践上，庄华兴是本地中文评论网站的专栏作者，针砭时弊，响应当下政治和社会课题。他也曾活跃于民办的马来西亚翻译与创作协会和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本文聚焦“左翼马华”和“翻译马华”这两个面向，提出庄华兴的论述和实践以“跨界主体”为核心，寻求为“马华问题”解套的方法。根据许德发，马华“问题丛聚”（problématiques）有多个面向，问题之大者实是“族群平等”问题。简言之，自 1950 年代独立宪制谈判开始，经历 1969 年五一三华巫种族冲突和随之而来的土著主义政策，华人民间社会和国家呈现对立情况，其源头是马来原地主义。许德发认为，华社内部的危机和忧患意识成了永恒的基调，追求族群平等成为最优先的问题¹。如此基调形塑且主导了后五一三的华社叙述，在 80 年代华人文化运动中更为显著²。在千禧年后“出道”的庄华兴和许德发可说都继承了这样的“80 年代马华精神”，惟两位知识分子在提出为“马华问题”解套方法的论述和策略上，却采取不同路径。许德发认为超克“马华问题”的方法并非召唤华族悲情，而主张以自由主义思想和普世人权为价值，建立跨族群公民国族身分。庄华兴虽然没有具体阐述“马华问题”，但其多年来的著述皆是对其的反思和响应。本文认为，他提出的方法是左翼思想和翻译实践，并且将马华问题放到“民族性”的框架讨论，而不局限于华人族群视角。

庄华兴的学术研究向来强调文史结合，通过史料的挖掘和整理提出新的命题和观点，并结合文艺理论解读文本，迄今出土了不少人物和作品。他对“左翼马华”的课题尤其关注，包括马共作家、左翼和无政府主义人士、现代派的崛起与

¹ 许德发，《在承认与平等之间：“思想视角下的马华问题”》（台北：时报出版，2023），页 32。

² 1980 年代，适逢国家文化政策出台十年，青年文化体育部向民间征询回馈意见，各华团动员整理要求，响应此影响深远的政策，其中一个重要的文件就是《华团国家文化备忘录》，此文件明确提出华人的文化要求，包括多元主义的国家文化政策的构想。除了发表若干备忘录，华团也从 1983 年开始在各州轮办华人文化节，凝聚华人共同体意识，建构多元的国家文化。重要讨论参林开忠，《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1997）。

论战、鲁迅对左翼文化圈的影响、冷战的介入等。此外，双语兼通的庄华兴在促进马华和马来文学的理解和交流上扮演重要的学者—译者角色，在这个领域几乎是踽踽独行。他曾提出“兼语写作”的理想和“土生性马华”的概念，试图论述一个独具特色的东南亚华人写作经验和身分认同。在他的自述中，庄华兴提及自己与本土主流中文学术界格格不入，因语言和传统文化传承是中文学界终极关怀，而没有当下脉络³。另一方面，他也不苟同旅台学者的离散文学和无国籍文学等论述，曾与旅台学者就“国家文学”和“无国籍华文文学”的课题展开辩论⁴。简言之，他主张马华文学放弃流寓心态，和国家文学意识形态顽抗，并且需深化在地认同的意义建构，以建立主体性。这个理念可说是贯穿他的学术和评论写作以及翻译实践。

本文第一部分尝试梳理庄华兴的研究取径和对象，探讨“左翼马华”在庄华兴的论述中，如何被构想成具思想性和批判性的马华（民族）主体思想，而左翼的跨界性（跨境、跨族群、跨语等）形塑了马华主体的进步内容。接着，第二部分讨论“翻译马华”，即庄华兴以跨语主义为方法，对华—马翻译进行规范性的批评，并且作出具体实践，对国家提出承认差异文化的要求。

二、左翼马华：民族主体与文学的政治

马来亚左翼运动的起源可追溯到 1910 年代传播至此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受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在一战前后南来马来亚华校任教，创办刊物传播布尔什维克思想，鼓吹推翻一切强权。这些人包括新加坡真社发起人胡笃初和范章甫、《益群报》创办人吴钝民，编辑许杰和刘克非等。1925 年轰动一时的吉隆坡爆炸案发生后，无政府主义运动在英殖民政府的打压下慢慢式微，接着南洋共产党（1927-1930）和马来亚共产党（1930-1989；以下简称“马共”）在共产国际的指引下成立。二战前后左翼组织公开活动，报刊如《现代日报》、《南侨日报》、《风下》、《民声报》、《战友报》等是左翼知识分子的论述据点，一直到 1948 年 6 月紧急状态颁布后才逐渐消失。马共在紧急状态后转为地下游击组织，其政治斗争持续到冷战结束的 1989 年。左翼从未在马来（西）亚正式掌权，马共被政府视为非法组织后，其他不搞武装革命的左翼势力从独立前至 60 年代末曾勃兴一段时间就被歼灭了。长久深远的反共政策和意识形态方方面面形

³ 庄华兴，〈回顾求学与治学之路〉，载许德发（编），《问学札记：二十二位青年学术人的自述》（吉隆坡：燧人氏事业，2012），页 21-28。

⁴ 相关论争可参考庄华兴（编译），《国家文学：宰制与回应》（吉隆坡：兴安会馆，黑风洞：大将出版社，2006）

塑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本文认为，庄华兴将左翼视为被压抑的社会运动和文学思想，尤其具有跨国意识、批判精神的左翼思想曾经是指引马华社会和马华文学的重要思想来源，惟在冷战的年代逐渐式微。一定程度上，他也将左翼思潮运动和马华社会的命运紧紧联系起来。

(一) 左翼文学场的形成与转变

大约自 2010 年以来，庄华兴着手研究马华左翼文学，交互使用“马华左翼”或“左翼马华”的概念来指称作为文学和历史的马华左翼文本。他认为，战前马华文学继承中国抗战文学传统，也深受左翼革命文学影响，积极学习鲁迅和其杂文的批判和战斗精神，形成了一个“左翼文学场”⁵。这个文学场中，有关文体的操作和变革以及外延性因素对其的影响（例如战争、紧急状态法令和冷战文化等），对马华文学史的建构有积极意义。这也呼应了自方修以来的马华文学史写作趋势，即以政治发展和社会脉动作为马华文学史的分期和主题，而非以文艺思潮衍变和经典作品为主旋律。庄不苟同单以经典作品构成的文学史（他称之为以旅台学者为代表的“菁英文学史观”），指出论述马华文学的发展和美学内涵必须同时结合历史经验和社会现实，无法脱离时代脉络和社会性质。他甚至认为，菁英文学史奉行的审美观念和品味价值“无法与华人地区的历史现实兼容”⁶，尽彰显其左翼文学观。

易言之，马华文学和新马华人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甚至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代表/再现”（represent）华人社会状况的文本。然而，庄同时也反对以政治史分期为主的文学史。他指出，为了揭示马华文学的“整体面貌与心灵真实”，从而确认“文”的优位性，论者必须从文体的操作与变革窥探文学史进程，并深入各时期文人/作家作品和心灵⁷。可以说，庄的研究视文本和文人为历史和社会产物，而文学史是一个“多重复杂的共同体书写史”，不应只着眼于显性的审美意识⁸。就此，庄华兴持续从史料挖掘出被遗忘或未受重视的左翼文人和作品，其目的不在于将他们经典化（金枝芒的特殊性除外），而在于追问曾经影响一代人的左翼思潮和运动对马华社会和文学的意义。从五四时期至战后，这些文人包括：

⁵ 庄华兴，〈马华左翼文学场的初步考察（初稿）〉，发表于“2012 年延安文艺国际学术研讨会”（西安：陕西师范大学主办，2012 年 5 月 16-17 日）。

⁶ 庄华兴，〈马华左翼文学场的初步考察（初稿）〉，页 12。

⁷ 庄华兴，〈马华左翼文学场的初步考察（初稿）〉，页 12。

⁸ 庄华兴，〈回顾求学与治学之路〉，载许德发（编），《问学札记：二十二位青年学术人的自述》，页 24。

《益群报》总编许杰⁹、推动世界语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尊生¹⁰、共产作家马宁¹¹、战前画家文人戴隐郎¹²、木刻画家周金海¹³、马共作家金枝芒¹⁴、战前南来文人代表作家胡愈之¹⁵、加影华侨学校左翼作家胡一声、张天白、流冰¹⁶、60年代《浪花》杂志的左倾青年¹⁷等。同时他也论及本地左翼人士的精神导师鲁迅在南洋的影响¹⁸。值得注意的是，他所研究并赞赏的左翼文人作家，大多是亲身参与在左翼政治活动中的作者。这也说明了他对作者及其作品如何反映时代甚至亲身参与社会实践的期待。同时，他论述中的马华左翼文学与马华左翼运动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然而，这并非他支持文学的政治化或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立场，而是着眼于文学的政治性，强调文学和美学不可能自外于意识形态，也反对论者毫无保留地相信文学能够绝对自足和自主，且不受时代脉络和意识形态牵制。

在庄华兴的论述中，“左翼马华”指的不只是现实主义的左翼文学，也包括了南洋和马来亚左翼政治下彰显的思想和“精神基调”，一套如今已走向异化且不受重视的具有思辨和批判性的论述。他认为，随着时代的更迭，马华文学思想含量随着文体精神基调的改变而递减。

⁹ 庄华兴，〈南洋时期的许杰及其思想〉，《世界文学论坛》，第四期（2018），页 53-59。

¹⁰ 庄华兴，〈黄尊生、世界语与无政府主义〉，《当代评论》（2024年3月8日）：<https://contemporary-review.com.my/2024/03/08/1-576/>。

¹¹ 庄华兴，〈马华文学的疆界化与去疆界化：一个史的描述〉，《中国现代文学》，第22期，页93-106。

¹² 庄华兴，〈帝国—殖民时期在东北亚与东南亚之间的文艺流动：以戴隐郎为例〉，载张晓威、张锦忠（编），《华语语系与南洋书写：台湾与星马华文文学及文化论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18），页151-178。

¹³ 庄华兴，〈鲁迅青年周金海：从执刻刀到执笔〉，《当大大马》（2019年1月12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459906>。

¹⁴ 庄华兴，〈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主体（性）论述的开展及其本质〉，载朱文斌（编）：《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第二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15-32；庄华兴，〈饥饿的历史巨兽：从金枝芒的长篇抗英战地小说说起（初稿）〉。21世纪出版社编辑部（编），《十年》（第十三集至第十四集）——抗英战斗故事辑（五）（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2013），页247-261；庄华兴，〈从失踪到隐匿：以郁达夫和金枝芒为例探讨马华文学的存在之义〉，载21世纪出版社编辑部（编），《缅怀马新文坛前辈金枝芒》（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2018），页17-36；庄华兴，〈存而不在的马华左翼作家——金枝芒〉，《当代评论》，2021年10月9日，<http://contemporary-review.com.my/2021/10/09/1-401/>。

¹⁵ 庄华兴，〈胡愈之的流亡与左翼理想主义〉，《当大大马》（2014年10月8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76861>

¹⁶ 庄华兴，〈马来西亚华校与马华左翼文运：以加影华侨学校为案例〉。徐秀慧、吴彩娥（编），《从近现代到后冷战：亚洲的政治记忆与历史叙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里仁书局，2011），页417-437。

¹⁷ 庄华兴，〈马华左翼文学场的初步考察（初稿）〉

¹⁸ 庄华兴，〈遥想五、六十年代新马鲁迅潮〉，《当大大马》（2013年7月8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35035>；庄华兴，〈冷战年代与鲁迅纪念的两面性〉，《当大大马》（2016年8月1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350731>；庄华兴，〈鲁迅在冷战前期的马来亚与新加坡〉。《思想》39号（2020），页201-217。

在战前现实主义时代，任何文类的写作皆带有杂文的批判精神，特别是批判帝国统治下的殖民主义社会。战后，在冷战氛围下，马华文学的精神基调趋向异化，它逐渐以“声部”与感官取代抽象性思维。¹⁹

可看出，庄将左翼文学与杂文代表的批判精神视为马华文学思想性的标竿，一种深刻的、具有批判性的人文关怀。他认为，“杂文精神”不限于随笔和杂文体，其他文体如小说、戏剧、诗歌也可以融入杂文精神²⁰。这种精神体现出来的是对殖民帝国和国家权力的批判，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怀和介入，以及作为引领思潮的先锋性思想理念。庄认为，马华文学常被视为饥饿又匮乏的文学场域，乃是因为杂文精神基调的消退和丧失。个中原因不仅仅因为国家自上而下贯彻的反共政策，也包括战后冷战文化导致的非左翼文学场的形成，以及本地左翼文本本身缺乏思想厚度。就后者而言，他以战前重要的左翼南来文人胡愈之为例，说明其通过报刊编辑、杂文和小说创作者等多元身分展现的杂文精神，未有后继者来承接。

马华左翼文本除了革命叙事，鲜少有其他更广阔的关照，对殖民与帝国的正面攻击多而分析性的批判与思考少，与左翼作为一种先锋性思想理念（包括对文学类型开拓）仍有一段距离。²¹

胡愈之在南洋左翼斗争论述的话语上占有重要位置，是难以否定的事实，南洋左翼斗争因而在枪杆与硝烟以外，平添了知识者/文化人笔杆的思想厚度。可后者一直都没有被后来者学好。²²

为了进一步说明“左翼马华”这一思想资源的重要性，庄华兴曾对近年来在马华学界引起极大关注的“马共书写”这一文类的定义和概念提出批评。他认为，目前学界一般将“马共书写”当作一种题材的书写分类（类似环保书写、饮食书写的分类），并没有特别大的意义，甚至导致左翼书写和左翼文学在以马共书写为名的讨论下被否定和抹杀。

¹⁹ 庄华兴，〈语言、文体、精神基调：思考马华文学〉。《思想》，28号（2015），页217。

²⁰ 庄华兴，〈语言、文体、精神基调〉，页217。

²¹ 庄华兴，〈马华本土、左翼马华：观看殖民与帝国〉，《文化研究》21期（2015），页243-247。

²² 庄华兴，〈胡愈之的流亡与左翼理想主义〉。

若着眼于“马共书写”，能讨论仅仅限于表现形式，并无法涵括卢卡奇（Georg Lukács）谓之的“总体性”命题。总体性涉及历史与政治的连续性发展，左翼文学研究既无法脱离人的叙事，也无法不把人置于历史脉络中进行考察。恰如卢卡奇所言，人非孤立的存在，现象的发生置于历史脉络中才能让人掌握事物的本质。左翼文学 / 作家的关怀在于创作的态度与精神，在写作关照视角上，左翼文学正视现实、批判现实；在总体性的关照下，左翼文学的特殊性方得以彰显，此即其美学所系，也是“左翼文学”和“马共书写”的最大分野。²³

在此，庄华兴强调左翼批判现实的创作精神，才是作为左翼文本的马共历史/书写最大的意义。换句话说，若非秉持着左翼文人的态度精神和关照视角创作“正视现实、批判现实”的作品，作家们纯以马共为题旨的作品，庄认为不宜被过度诠释和解读，因其实际上和“左翼”本身并没太大关系。不过，这个意识形态强烈的观点也否定了非左翼的马共书写（和其他关于左翼历史和运动书写）反思马华左翼历史的可能。

庄华兴念兹在兹的马华左翼精神和左翼文学场是何时和如何走向衰落的？近年来，他开始把焦点放在冷战。在冷战对立的年代，文学作品被放到非左即右的语境下讨论，呈现出简化的现实派 vs 现代派两个阵营的论战。庄华兴认为论战两方无不依循相同的模式：抑制与贬抑对方后自我经典化，无论是在美学上或意识形态上，其“交集、论辩不足，意气之争有余”²⁴。一方是受革命文学启发的社会现实主义，一方面是拥抱自由主义美学的现代主义，但两方皆从各自的意识形态出发，且强调自己的“此时此地”内涵和本土化的实践。左翼阵营打着“此时此地”的鲜明旗帜，正当化自身耕耘在地现实；而“非左翼”的《蕉风》文人亦强调其提倡“马来亚化”的本土贡献²⁵。

近来学界兴起的文化冷战研究中，揭露了“第三势力”的友联出版社及其重要刊物《蕉风》和《学生周报》的美援背景，再次让左右对立的冷战论述重新冒

²³ 庄华兴，〈从“马共书写”想起的若干问题〉，《当代评论》（2018年11月30日），<https://contemporary-review.com.my/2018/11/30/1-127/>。

²⁴ 庄华兴，〈冷战在马来与马华文学场域的介入与冲击（1950—1969）〉，《文化研究》32期（2021），页60。

²⁵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学者 Jeremy Taylor 指出，“马来亚化”的主张不尽然是反殖民的在地化实践的表现；反之，英国殖民政府亦推出政策支持“马来亚化”，以建立左翼/共产主义是“外来的”印象。这当中，《蕉风》的创立以及其和马华公会、亚洲基金会的关系，就印证了其不同于反殖运动的“马来亚化”路线。参 Jeremy Taylor, “‘Not a Particularly Happy Expression’: ‘Malayanization’ and the China Threat in Britain’s Late-Colonial Southeast Asian Territor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8: 4)(2019), pp. 789-808.

现。遂有学者追溯友联诸人的政治动机，提出反共第三势力文人在马来亚建立起抗衡左翼的文化力量，实受制于美国冷战意识形态和金援²⁶；亦有学者强调回归文学的本质，就文学论文学，客观评价友联文人和《蕉风》的文学贡献²⁷。对庄华兴而言，冷战时代的马华文坛完全僵持在两极化的意气之争中。然而《学生周报》和《蕉风》在 1950 年代“适时”诞生，成功转换甚至“取代了一两代人的美感趣味”，显示冷战意识形态如何形塑了文学发展和审美标准²⁸。换句话说，他念兹在兹的左翼文学场就此让位给现代主义文学，后者迄今为止仍是马华文学的主旋律。这是马华文学的关键时刻，也间接说明庄为何特别关注战前和战后初期左翼文人研究（下节讨论），而非冷战时期作家。

然而，庄华兴并不简化地批判现代主义的“入侵”。他以“民国遗绪”的概念来理解友联诸子在南洋的活动和角色，将他们视为贯彻自由民主思想的民国文人，把国共对立的遗绪带到新马来。

民国思想以自由主义为基础。学界普遍认为自由主义是五四启蒙运动留下的遗产，也是指一种新的方式和新的建国理念。然而，对第三势力文化人而言，母国的建国理想已成过眼烟云，唯有寄托在南洋异域的文化重建之上，纵使易地而处，惟不变的是，坚持以自由主义、民主思想为建制的基底。离散香港的文人、学者无论在观念上或行动上或多或少受到本时期自由主义思想的冲击与影响。它为六〇年代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生成提供良好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蕉风》出现为数不少的民国作家的文章，一直到 1960 年中期以后才减少。

马华（民国）文学实质一方面体现在它的思想内涵、趣味与风尚上，在冷战的时代氛围中，它也把国共的势不两立带到新马来，并以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对立形式出现。《蕉风》202 期以前，出现不少文章涉及对现实主义教条的批驳，这些都是国共对立在海外的余绪。²⁹

²⁶ 许维贤，〈文化冷战中的“隐形宣传”：论友联出版社与《蕉风》在新马的经营（1955-1970）〉，《二十一世纪》，总 193 期（2022），页 120-141；Jeremy E. Taylor，“Not a Particularly Happy Expression”。

²⁷ 林春美，〈《蕉风》与非左翼的马华文学〉（台北：时报出版，2021）；张锦忠、黄锦树、李树枝（编），《冷战、本土化与现代性：《蕉风》研究论文集》（高雄：国立中山大学人文研究中心，离散/现代性研究室，2022），页 71-96。

²⁸ 庄华兴，〈冷战年代与鲁迅纪念的两面性〉。

²⁹ 庄华兴，〈战后马华（民国）文学遗址再勘察〉，《当今日大马》（2015 年 6 月 2 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300401>。

这样的民国遗绪甚至一直残留至旅台马华文学出现的时候，是马华文学“中国性”的体现，并以李永平为代表。下一节论及左翼作为庄华兴论述中理想的马华“民族主体”时，我们就可理解他为何排斥民国遗绪和中国性，实因他们妨碍了民族主体的建立。就此，他不同意以暧昧的“非左翼”来指称第三势力文人，而强调他们在冷战时代实属右翼。

在冷战时期非左即右的语境下，第三势力文人实际上属右翼群体。他们在香港时期反中共反蒋，面对星马冷战的策略性需要，台湾被视为自由中国，反蒋成为禁忌，唯一可为的是配合殖民政府（以及后来成立的新生国政府）推行反共，并争取在海外建立中华文化堡垒。第三势力及其他右翼文人在五、六〇年代香港与星马的文教活动与出版扮演上述角色。³⁰

他继续申论，虽然《蕉风》文人批评左翼现实主义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打击，但反左翼意识形态的现代主义“何尝不是另一种意识形态”³¹。

他也不忘为现实主义叫屈，认为当代人对左翼现实主义文学的误解和贬抑，其实是不了解现实主义。他指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其初衷在深入关照和思考人的生活处境。

一个作者如何总结历史经验，进而以谦卑的态度看待当下人的命运，这才是回答大历史叙事的现实性意义所在……创作除了作为一种审美活动，更体现作家个人对生活处境的关照与思考。在“人的处境”与“人的生活处境”之间，笔者以为两者没有排斥，但后者不应被排除在外。³²

冷战“结束”后的数十年来（或论者所谓的历史已然终结的时代），现实主义早就被认为不合时宜，人人避之唯恐不及。惟庄华兴强调现实主义作品仍有可为之处，好的现实主义作品能够掌握问题的核心，突出问题的矛盾和纠结，呈现其思想性和批判性。对他而言，近二十余年来马华文学发展却是往反方向走，作家

³⁰ 庄华兴，〈五〇年代南渡的香港第三势力文人〉，《当今日大马》（2021年6月4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577626>。

³¹ 庄华兴，〈五〇年代南渡的香港第三势力文人〉。

³² 庄华兴，〈现实主义写作仍有可为——兼谈流军长篇《林海风涛》〉，《当今日大马》（2016年1月29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328734>。

以形式和技巧包装，无法直面思考和响应时代与现实，而选择“思想缴械”，沦为文字工匠³³。这是庄华兴对当代马华文学发展的沉痛批评，但也说明他颇为固执地坚信，以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创作出的作品，必然较现代主义作品更有思想性和批判性。

就此，若我们回到庄华兴所谓的“精神基调”来理解这个批评，大致可以总结出：左翼才是具有批判性和主体性的文学，而战后受制于文化冷战和反共政策，带着民国遗绪的右翼/非左翼则转向个人心灵自由的追求，呈现出离散、流寓、流离失所的心态而缺乏向心的主体性追求，更别说尝试建立具有集体性的“民族”主体。不过，他也同意，无可否认马华文学的离散面向也造就了他迷人的风采³⁴，例如他研究的杨际光³⁵和黄润岳³⁶就呈现这样的姿态。离散有没有主体性？这是值得追问的话题。但就如他在《国家文学：宰制与响应》一书中强调的，“所谓的文学的跨国流动/流寓论纯粹是一种伪装姿态，内在精神的复返才是真正灵魂”³⁷。这一观点也贯彻于他的马华文学论述中。

(二) 跨界左翼作为民族主体

虽然庄华兴对离散心态不甚满意，但左翼思想本身亦是经历跨国、跨界的流动才在马来（西）亚生根。值得注意的是，庄华兴推崇的左翼文人及作品，大多是战前至战后初期在“中国—南洋”跨境流动的作家。他将这时期的左翼作品视为受中国革命文学影响的“南洋大后方文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延伸³⁸。抗日战争前后中国知名左翼知识分子如郁达夫、胡愈之、沈兹九、张楚琨、王纪元、邵宗汉、王任叔（巴人）等人南来，传播先锋的社会主义和革命理论。虽然他们的目标是鼓励海外华人支持中国抗战，但也促使海外华人对于参与当地民族运动有了较清楚的政治想象和认同³⁹。战前至战后初期的左翼文学，在庄的论述中是马华文学最具思想性和批判性的左翼文本。战后至马来亚独立前后的左翼文学，

³³ 庄华兴，〈现实主义写作仍有可为——兼谈流军长篇《林海风涛》〉。

³⁴ 庄华兴，〈双殖民主义下的马华（民族）文学〉，载龚显宗、王仪君、杨雅慧（编），《移民、国家与族群》（高雄：中山大学人社科学研究中心，2010），页 185。

³⁵ 庄华兴，〈落在香港、吉隆坡和纽约的雨：杨际光的离散现代性〉，《中国文学学报》，第二期（2011），页 327-340。

³⁶ 庄华兴，〈黄润岳在（后）大分裂时代的家国想象〉，《当今日大马》（2013 年 11 月 14 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46566>。

³⁷ 庄华兴（编译），《国家文学：宰制与回应》（吉隆坡：兴安会馆，黑风洞：大将出版社，2006），页 13。

³⁸ 庄华兴，〈马华文学的疆界化与去疆界化：一个史的描述〉，页 99。

³⁹ Guo-Quan Seng, “Revolutionary Cosmopolitanism and Its Limit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Medan and Jakarta Compared (1945-1949),”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16.1 (2020) : 8.

经历本土认同的转化，其书写视域和论述主轴已从以中国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反帝反殖话语，进入耕耘多元本土的范畴，并以 1947-48 年的马华文艺独特性论战为指标。

庄华兴指出，南洋华侨从战前华侨中国民族主义过渡到战后华人民族主义，也标志着“马华书写意识的滥觞”，尤以马共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为文学主流，关键人物是长久隐匿的马共作家金枝芒——即独特性论战的主角周容⁴⁰。换言之，虽然战前有不少论及书写本土的讨论，战后以文艺独特性论战为节点，作家们书写本土马华文艺已是水到渠成，当中隐含着建立具有主体性的新兴“马华民族”的理想，并以左翼为思想基础。

然而，本土认同的转化并非径直单向。相对于其他亚洲地区，马来亚左翼运动呈现出民族主义的不同面向。参与政治运动的左翼华人必须时刻反思自己的“外来人”身分，在远距支持中国革命之时也必须同时耕耘驳杂的本土力量。长期身处西方殖民地的他们，累积了反殖民族主义的思想和实际经验，成为和其他族群连结的资源。因此，左翼涵盖的不只是阶级话语，还包含超越族群/民族身分的结盟。对马来亚华人而言，左翼思潮不止形塑了华人民族主义，亦沟通了跨族群反殖民独立运动的民族主义。例如，马共成员以华人居多，自然以中国革命为主要关注，但其从创党初期就有建立华、巫、印跨族群阵线争取马来亚脱离英国殖民独立的目标，却一直摆荡于跨族群和华人民族主义之间，直到战后 1946 年才定下明确的国家认同，效忠马来亚⁴¹。

“民族-国族”之间的张力，一直是华人左翼运动在马来（西）亚面对的巨大挑战。然而，这也是马华“跨界左翼”的特色所在。本文指称的跨界，包含广义的跨国、跨境、跨语和跨族群的概念，仅在于指出左翼文学和运动并非也不能是僵化的民族主义。战前和战后初期的左翼运动，不可能以单一同质的国家界线为分野。一些学者如历史学者原不二夫将知识分子分为支持中国或耕耘马来亚的二元阵营⁴²，并无法展现左翼思想的跨国网络和论述的复杂性。庄华兴并不将“民族-国族”的张力视为负资产；反之，在建立多元族群民族国家的目标为前提下，他试图发展左翼“马华民族”概念雏型，并定义马华民族文学。然而，此处的民族（nation）概念以身分政治属性为基础，未见其对民族文学的美学思想的讨论，随后他也未深化此论述。

⁴⁰ 庄华兴，〈饥饿的历史巨兽〉，页 184。

⁴¹ 陈平，《我方的历史：陈平回忆录》（新加坡：Media Master，2004），页 146。

⁴² Hara, Fujio. *Malayan Chinese and China: Conversion in Identity Consciousness 1945–1957*.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3.

马华民族文学的本质有三：一是集体性，它涵盖一个庞大的书写群体，目的是为了完成某种时代任务，如战前的左翼抗争。因此，它没有特定意义的作家和文本概念。它最初主要以中国南来文人为核心，战后在地青年逐步增加，然而，仍然深受左翼思潮影响。其次是内延性（internal context），指因某种客观现实引发的忧患意识，譬如在抗战时期对祖国前途体现出的深切忧思；第三是外延性，指国家属性的形成，争取马来亚公民权，并积极参与独立于建国斗争。这与独立后的民族自决的要求有密切的关系⁴³。

其中，马华民族的集体性是显而易见的，而萦绕着这个民族的“马华问题”的几个关键词也在此段落凸显：时代任务、忧患意识、建国斗争。然而，“内延”和“外延”的定义却不甚明确，未能让人把握“马华民族”内部和外部的疆界视域以何为界，其挑战又为何。不过，大致可理解庄华兴虽然将华人放在民族国家（nation-state）语境里讨论，即华人作为多元马来西亚国家的其中一个族群（ethnic group），但也指出这个族群具有第三世界的民族性（nation-ness；在反殖独立抗争、争取自决自主的意义上）。换言之，虽然族群身分焦虑一直是历久弥新的重要“马华问题”，但亦不可忽略其民族性的意义。就此，他也将民族性和左翼抗争连结起来，意味着唯有左翼才能达成民族使命。然而，带着“民国遗绪”的友联诸子，何尝不是文化民族主义者，惟他们在政治上相对保守，因此不符合庄的马华民族定义。

民族是个老话题，甚至让人觉得过时守旧，但庄华兴认为马华文学仍未到弃绝民族文学属性的阶段。这是因为：1、它仍然重视身分认同。它一方面加强对民族身分的认同，另一方面它也尝试维持着它与国家的关系。2、客观的压迫—国内的、国外的—仍然没有消除。如：中心—边缘二元对立思维的坐大，文化帝国主义的扩张等。3、它对本土的认同愈来愈强烈⁴⁴。概言之，身分认同这个萦绕不去的“马华问题”是马华文学民族性的特色。除此之外，庄华兴曾以“双殖民主义”来形容马华文学在殖民地面对英殖民和中国“软殖民”的经验⁴⁵，指出马华民族主义的起伏亦是响应殖民主义的方式。不过，有关马华左翼文学如何受中国性牵制的问题，庄的讨论仅止于战后初期，并未处理 1960 年代以后的作品。

⁴³ 庄华兴，〈马来西亚华校与马华左翼文运〉，页 419。

⁴⁴ 庄华兴，〈陈映真与马华（民族）文学〉，《当今日大马》（2017 年 7 月 1 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384203>。

⁴⁵ 庄华兴，〈双殖民主义下的马华（民族）文学〉。

但马华文学的中国性问题并未在国家独立、建立马来（西）亚国族身分后就获得解决。例如 1960 年代左翼《浪花》杂志和文革潮文学，以及 1970 年代非左翼的神州诗社、天狼星诗社的文化乡愁，是否再次对马华民族主体性造成威胁和挑战？庄尚未开展这方面的论述，似乎相当肯定建国后的国族身份足以让马华文学摆脱中国性问题。

另一方面，相对于他研究马来民族性及马来现代文学对殖民主义的响应，“马华民族”面对殖民主义和现代性挑战等问题并未获得同等的关注。因此，作为第三世界民族文学的马华文学这一个观点尚待深化。反之，作为小文学的马华文学如何面对“国家”并追寻主体性则是他多年来论述的重点，这点将在本文第二部分“翻译马华”论及。

作为本节的小结，如果说庄华兴的马华文学论述以“文学的政治”为主轴应不为过。尤其，他在约 2015 年以后对文化冷战之于马华文学的影响多有研究，包括冷战下的禁书令⁴⁶（2018d）、驱逐令⁴⁷（2019a）、冷战文化机构如民众图书馆的成立⁴⁸（2019b）等。然而，这也是论者将他的论述视为“太政治的、非文学的”批评。本文认为，庄华兴始终关怀的是文学而非政治本身，即作者思想构成的脉络、创作精神基调、美学表现的选择等。惟他强调文学并不隔绝于历史、社会和政治的总体性影响。换句话说，文学虽然外在于政治（这也是文学本来的批判位置），但我们所看见的文学面貌并不单纯。尤其作为第三世界文学的马华文学，其发展历史中殖民性、身分认同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深远；追求文学的纯净和去政治只能看见马华文学相当片面的一面。就此，庄华兴采取扣问主体性的方法，并以“跨界左翼”为论述的立足点。如果论者要更进一步追问庄华兴关心的是文学的主体还是政治的主体，这恐怕无法用此消彼长的二分逻辑来简单判断孰重孰轻。或许，无论是从文学或政治出发，两者都应把彼此“包括在外”（借用王德威语），方能更全面地欣赏和分析马华文学。

三、翻译马华：作为方法的跨语主义

⁴⁶ 庄华兴，〈冷战前期的新马华文禁书情况〉，《当今大马》（2018 年 11 月 14 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451815>。

⁴⁷ 庄华兴，〈紧急状态时期的驱逐出境法令〉，《当今大马》（2019 年 5 月 20 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476789>。

⁴⁸ 庄华兴，〈冷战时期的民众图书馆〉，《当代评论》（2019 年 12 月 17 日），<http://contemporary-review.com.my/2019/12/17/1-226/>。

庄华兴另一个学术贡献是关于翻译与双语（或兼语）写作的思考，本文以“跨语言”或“跨语主义”概括之。“跨语主义”的提出，跟庄华兴对大马华人现实处境的观察，以及他对马华如何在多元语言环境中建构主体身分的思考有关。此思考主要集中在千禧年前后，重要成果是《国家文学：宰制与回应》的出版，至此观点大致底定，此后没有太大变化，即便面对学界同侪的批评，也甚少改变立场。

庄华兴的“跨语主义”思考，其实延续自 90 年代以降当代马华文学学术建制化后所开启的问题意识，特别是林建国〈为什么马华文学〉、张锦忠〈中国文学影响论与马华文学〉等诸篇重要论文⁴⁹。而这个问题攸关马华文学处于中国与大马国家文学之间的主体地位的暧昧不明。一方面，马华文学可能被中国以世界华文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之名目而包括在中国文学内部的边陲；一方面，马华文学又因为不符大马国语政策而被放逐在国家文学的外部。如何让马华文学在上述困境中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位置，成为庄华兴学术生涯中不断思考的问题。对此，他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跨语主义”。

追溯起来，庄华兴的问题意识与跨语言思考，除了跟上述脉络相关，也可能与 80 年代华人文化运动的精神有所继承。也许正因如此，尽管在千禧年前后马华学界开始受到西方当代文化理论（如跨国离散）的影响，从而质疑民族国家与国家文学的正当性，庄华兴并没有与之起舞；同样的，也由于认同于马华文学承载了发展民族文化的使命，从而他也对“文学为文学”的主张不表认同。反之，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了 80 年代马华精神的问题意识与使命，即尝试把马华文学与文化纳入多元主义的国家文学与文化之中。所谓“80 年代马华精神”，具体指华社以民间姿态与政府对话、抗衡，继而追求政府承认少数民族文化，并视之为国家文化的一部分。换言之，它也是大马华人知识分子参与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提出的承认政治（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的实践与精神体现⁵⁰。此文化运动虽有诸多不足，但长期来在华社却酝酿一些进步观念，包括文化遗产保育的意识⁵¹、民办文物馆的构想⁵²等；此时的“华社”虽跟自主且独立的公民社会的理想可能还有段距离，但虽不近却不远，亦即在不否定国家正当性前提下，让国家与社会分离，维持独立性。“80 年代马华精神”在 90 年代全球化到

⁴⁹ 参陈大为、钟怡雯、胡金伦（编），《赤道回声：马华文学读本 II》（台北：万卷楼，2004）。

⁵⁰ 查尔斯·泰勒，董之林、陈燕谷译，〈承认的政治〉，载汪晖、陈燕谷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页 290-337。

⁵¹ 张集强，〈华人贡献的实证：大马华人文化遗产保存概况〉，载文平强、许德发（编），《勤俭兴邦：马来西亚华人的贡献》（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9），页 415-443。

⁵² 吴小保，〈文化反抗国家文化：马来西亚华社民办文物馆构想的形成〉，《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第八期第二卷（2019），页 1-16。

来之后随即面对两大挑战，其一是中国崛起，马华精神可能抵不住中华民族主义的诱惑而重新回归文化中国的怀抱；其次资本主义全球化，伴随而至的是西方当代文化理论的兴起，民族国家的正当性遭到质疑和否定。而庄华兴就是身置于这个时代背景中成长，并养成其个人的学术人格与独特的知识储备。故此，不论庄华兴本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其立场——力拒返祖归宗（不认同大中国）、捍卫国家文学的当代正当性（不苟同跨国离散的生产性）、拒绝单一语言文化政策（批判马来文化霸权）——都可视为是“80年代马华精神”的继承人与守护者。另一方面，庄华兴跨语主义的重要主张，包括多语国家文学、翻译、双语（或兼语）写作等，其实都可在“80年代马华精神”找到思想源头。例如大马翻译与创作协会（简称译创会）创会元老陈育青在80年代曾主张透过译介在马来文坛厘清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差异，从而解决国家文学问题⁵³，这点跟庄华兴的巫译马华文学是向客体文化宣告主体在场的说法颇为相似。又比如，独立时期国语运动推手兼译创会顾问杨贵谊也曾提倡大马华人应发展国语和华语的写作能力⁵⁴，这跟庄华兴主张的双语（兼语）写作理念相契合⁵⁵。

以下针对庄华兴的跨语主义作具体分析。本文的跨语主义指透过多个与语言相关的文化实践——这种实践有时跟对事实的理解与认知有关——来追逐实现一个特定的文化理想。在庄华兴的个案，其文化理想无疑是多语主义的国家文化。从承认的政治的角度来说，在一个民族国家之内部，主导民族（majority）对少数民族文化（minorities）采取的承认或不承认立场乃至扭曲的承认，都对该少数群体的主体身分产生深刻影响。也因此，“承认的政治”是一个动态的、持续不断的文化反抗运动：少数群体对多数群体追求承认。由于这是对一个或多个有别于主流或位居权力中心的文化形式的承认，故也被称作为差异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很显然，这一差异政治的逻辑跟传统对于“民主”的设想前提存在着张力关系；前者追求对差异的承认，而后者则基于每个社会成员共享一样的文化形式，由于此文化同构型而承认所有成员的地位与尊严一律平等，从而享有

⁵³ 陈育青，〈华巫文学的译介与交流〉，《南洋商报》（1984年3月11日），版面不详。

⁵⁴ 杨贵谊，《华马文化论丛》（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14）。

⁵⁵ 关于庄华兴的知识背景，本文想补充几点。在他少数回顾个人经验的文章，揭示了他自小在胶园长大的经历，他家比邻是马来甘榜，自小对马来人不陌生。中学时期他在《好学生》半月刊认识其他文友，如许育华、祝家华、林建国、孙彦庄等人，并在全国各地举办文友会、文艺营。中学时期因学校图书馆缺乏华文图书而开始涉猎马来文学，中五那年在《文道》月刊发表译作。他自述1987年（25岁）参与译创会（1997年的笔误？），自此更有系统的从事翻译马华文学的工作，见庄华兴，〈边陲地带〉，载张永修、林春美（编）《我的文学路》（吉隆坡：嘉阳，2005），页175-180。1980年代的《文道》是本地华社顶尖刊物，各种专题报道紧贴华人文化运动的社会脉动。庄华兴以“庄华”为笔名在《文道》发表译品，表示他是该刊的读者，思想受其影响自在情理之中。另，译创会也是华人文化运动的产物之一。据此可证明，庄华兴与“80年代马华精神”息息相关。但也必须指出，此非其唯一的思想来源。

平等的权利。根据以上，马华文学主体正落在“差异的政治”的范畴中，一个追求有别于主导民族文化所应享有的文化权利，而这种权利从自由民主角度来看具有正当性。

仔细说来，庄华兴的跨语主义有两个实践面向，分别是（一）语内的实践，如方言和华文之间的关系；（二）语际之间的实践，即华文和外文（特别是马来文）的关系。如前所述，这不仅是一套强调策略的实践方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根据其对客观事实的认知判断而发展出来。

先分析语内的实践。庄华兴认为作为少数的马华文学（Mahua minor literature），其天然本质必然是“翻译的文学”：“在语言的操作上，华语是经过多重转化的语言，对大多数在地马华作者，华语不是华人社会自然生成的母语，是经历绝大力气跟华语搏斗才逐渐把它驯服（domestication）。”⁵⁶庄在其他文章根据这点认知而认为马华文学的写作其实就是兼语写作的一种⁵⁷。姑且不论庄对此的认知判断是否正确，这无疑反映了其对马华社会的个人理解，即华语华文非大马华人之母语，而是习得语（acquired language）；母语其实是“方言”。

事实上，华人母语是庄华兴“跨语”思考中少数出现立场转变的一点。他早期提倡兼语写作时曾提到，“母语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势必大大提升他对母语写作的信心与向心力”⁵⁸，此处的“母语”是指“中文”或“华语华文”而非“方言”。庄在几年后的一篇文章中则提到马华社会存在“双母语族”、“华英双语族”和“华马双语族”的现象，其中“双母语族是华语和方言的高频使用者（在此地，母语与亲族或血缘没有必然的关系，反而受社会文化语境深刻主导。这里的双母语指华语和方言），这个群体一般上教育程度不高，部分来自华文独立中学……”⁵⁹。从“母语是中文”到“双母语族”再到“华语非母语”，庄此一立场的转变不可谓不大，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这个变化？我们认为，这变化可能跟知识界与学界对此课题的讨论有关。庄华兴曾为陈良《大马华族文史正论》写序，该书收录陈良与迦玛辩论华人母语课题的若干篇文章⁶⁰；迦玛在辩论中透过方言来解构“华语是华人母语”的一般定见，而陈良则驳斥其观点。庄为陈良写序，说明他关注此论争，但其立场跟陈良有别。另外，近年学界热衷讨论华语语系文学，该理论有多元华语一说，庄可能受此影响。

⁵⁶ 庄华兴，〈未完的翻译，未尽的思考（后记）〉，氏（编译），《西昆山月：马来新诗选》（加影：貘出版社，2016），页323。

⁵⁷ 庄华兴，〈语言、文体、精神基调〉。

⁵⁸ 庄华兴（编译），《国家文学》，页20。

⁵⁹ 庄华兴，〈回顾求学与治学之路〉，载许德发（编），《问学札记：二十二位青年学术人的自述》，页21-28；此文注明完成于2008年。

⁶⁰ 陈良，《大马华族文史正论》（吉隆坡：林连玉基金会，2011）。

无论如何，庄华兴后期把母语和华语等式关系拆解开来，也表示他心目中的马华主体不是固定不变，而会随内外因素的变化而出现概念蠕动。从“80年代马华精神”来看，这一立场的转变，一定程度上是从当时华社主流共识移向少数异见者。80年代华社热衷讨论国家文化、华人文化等课题，当时在《文道》引发一场小规模论战，论争主角是人类学者陈志明和真实身分不详的文非。在讨论多讲华语运动时，陈志明有别于大部分华社精英采取放弃方言、推举华语的立场，他在不完全否定华语运动的前提下，反对少说方言的口号⁶¹。就此而言，“80年代马华精神”在“华人文化”的课题上，各知识分子有自己不同想象。而庄在此课题的转变，可说是无意间选择了“陈志明”的位置，即保留了个位置给方言。从这角度来看，跨语主义的语内实践面向比较像是对原来概念的弹性说法，而庄本人并未对此作更深入探析，此说也未引述语言学界对华语、母语、方言的研究成果从而缺乏严谨论证与理论根据；更重要的是，他未对此一语内面向的跨语主义赋予更颠覆性的政治功能。故此，在其跨语言论述中，这一面向的讨论并不完整也相对不重要。

如果说把马华文学的创作（方言-华文）视同于“翻译”或“兼语”——也就是语内实践的面向——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无法接受。那么，跨语主义的另一个语际实践面向，在定性上应该不至于有太大争议。从翻译角度看，这一面向在庄华兴的讨论中比较侧重的是马来文译华文（马译华）和华文译马来文（华译马）。从兼语角度看，一个精通华文和马来文双语的写作人，某种程度上在进行双语创作时就是在进行着“翻译”；换言之，翻译和兼语这两个概念是可互通的，故可以“跨语”概述之。有必要提出的是，庄对此语际实践的跨语主义赋予了政治功能，从而使它更具策略与实践的意义。例如他在跟黄锦树辩论时曾指出：“异于黄锦树的策略性考虑，我以为马华文学要汇入国家文学主流，马华作家何妨考虑朝华马双语创作的路向走，其作品一旦达致某种艺术高度，也就是单语符咒失灵的时候。”⁶²跨语言书写针对的是单语主义。

庄华兴认为马译华（华译马来文学）的翻译实践，对马华文学来说是一种养分的汲取：“透过马→华翻译（番易），马华文学/文化直接从马来文学及其他民族文学汲取滋养，藉以加强个体文化体质，实践自身的主体建构。”⁶³此处显然是从文化建构的角度思考“马译华”的翻译实践。这一观点对于大马翻译界来说相当重要。虽然马来西亚是个多语社会，却非由单语个体而是多语个体组成的多

⁶¹ 吴小保，〈国家文化与最后的马来亚人——八〇年代《文道》多元文化论争〉，《当代评论》，<https://contemporary-review.com.my/2021/12/19/1-416/>。

⁶² 庄华兴（编译），《国家文学》，页 115-116。

⁶³ 庄华兴（编译），《国家文学》，页 18-19。

语社会。因此，当国语扩散为国内的普遍共同语言之后，“华译马来文学”（马译华）的正当性就存疑；既然大家都能直涉原文，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何还需要翻译？⁶⁴“汲取养分”之说正可响应“普遍语言”（国语、英语）对“翻译”带来的挑战与质疑，其反向思路是：尽管大家通晓国语，但是华译马来文学可充实马华的翻译文库，故仍有存在必要。从差异政治的角度来看，不妨这么说，这是对国语国文作为普遍语言，提出必须承认非主流语言的差异性的命令，这包括捍卫翻译与使用该语言创作的正当性。

另一方面，庄华兴并没有从“汲取养分”的角度来看待语际实践的另一个面向，即华译马（巫译马华文学）的翻译实践。他认为，“华→马翻译的作用主要不在资源的交易”，而是作为“建构个体防卫机制的一个环节”⁶⁵由此可见，庄的跨语主义的语际实践——“翻译马华”，一定程度可包括“兼语写作”——在不同的语文场域被规定了不同的运作逻辑。在华文场域，它被视作“资源交易”的环节。在马来文场域，跨语主义更重视的是“防卫机制”。前者是“市场逻辑”（透过商品交换积累资本），后者则是“斗争思维”（建立边界、区分你我、攻城略地）。所谓“斗争思维”主要对应他的“防卫机制”说法，并非指其在鼓励暴力，而是指其更着重于“话语”的争夺。无论是“市场逻辑”（积累文化资本）或“斗争思维”（话语争夺），都跟马华文学的主体性有关。前者使空虚的马华文库得以充实，后者则让这个主体在马来文场域宣告在场，从而不会随意被他人给解释或收编。也因此，相对于“市场逻辑”对一切商品之交换（文化资本）持相对开放的姿态，因此是自由领地；“斗争思维”则由于有更强烈的文化使命，集论述者、创作者与译者身于一身的庄华兴，对此不仅仅作出客观描述与分析，还作规范性的批评；不仅在论述上作出批评，在实践上也如实地追逐自己的文化理想。

庄华兴对翻译马华的活动有两个重要的规范批判，他指出好些马华译者其实缺乏对自身主体的认知。马华翻译界在 80 年代应华人文化运动而组织起来，译者把翻译视为一种实践策略，透过翻译把马华文学送进国家文学的殿堂，同时与中国文学撇清关系⁶⁶。然而，当代翻译马华来到 90 年代却从“巫译马华文学”转

⁶⁴ 这类观点可参考 Goh Hin San, 按他说法，随着国语教育普及化，翻译工作的重心应该转向巫译马华文学。马来知识人也多持这类见解，如 Anwar Ridhwan 也主张，与其从事翻译，不如推广国语。见 Goh Hin San, *Sumbangan Keturunan Tionghua Malaysia dan Singapura Terhadap Bahasa dan Sastera Melayu, Bahagian Tugas untuk Peperiksaan Tamatan pada Jabatan Pengajian Melayu Foon Yew* (unpublished); Anwar Ridhwan, “Proses Memahami Pengucapan Sastera dalam Konteks Sastera Kebangsaan”, *Dewan Sastera*, (Februari 1989), pp. 54-55.

⁶⁵ 庄华兴（编译），《国家文学》，页 19。

⁶⁶ 陈育青，〈华巫文学的译介与交流〉；叶健，〈华马文学的译介与交流〉（吉隆坡：专业出版社，1986）。

向同时兼顾“译介中国文学”的双重心，后者甚至大有取代前者的趋势。庄华兴对此趋势颇有意见，原因是“华文译马来文”被他赋予了“防卫机制”的功用，是向“客体宣告主体文化的在场”，因此必须“划定文化边界”，避免“被强势文化收编”⁶⁷。按照他的思路，如果“译介中国文学”在翻译马华中喧宾夺主，成为翻译人优先工作，则又要如何在马来文场域宣告马华文学的“主体文化的在场”？庄华兴搜集 1961 至 2001 年间马华的文史哲巫译著作，盘点后赫然发现当中居然有百分之五十五点八是中国作品，百分之四十五点二是马华本土作品。此数据坐实他的批评意见，他据此质疑马华译者是否了解何谓“马华文化”，并认为这暴露了译者对马华文化主体的认知匮乏⁶⁸。

庄华兴对马华社会“跨语”现象的另一个规范批评则指向华裔马来文学作家。他对活跃于马来文坛的华裔作家所书写的华人故事颇感担忧。在跟黄锦树辩论国家文学课题时他提到：

上世纪七、八〇年代极端种族化的政治环境对马华双语作家造成的冲击是关键因素。要么华人，要么进蕃做马来人。我想这两者都不是双语作家所愿。……渐渐地，我们看到纯马来教育的华裔马来作家开始赶上了（部分作者甚至表示曾以上述作者为榜样，誓得文学大奖，林天英之于吴天才和年红即一例。吴君曾任国家文学奖评委）。从双语作者退守马华文学，而单语华裔马来文学作家在国家范畴中正式代表华人，让国家文学的同构型找到了其合理性基础，从而加速其单元建制化进程。⁶⁹

既然在马来文场域中无论是透过翻译或双语写作都肩负“防卫机制”的功能，具有向他者宣告主体文化在场的意义，那么这个“主体性”话语权就有必要加以保卫，否则很可能被不通晓华语的华裔马来文作家所夺取，从而加速单元国家文化的建制化进程。换言之，庄华兴本身的双语视域让他相对敏锐地察觉到，马华文学在马来文场域中的再现的重要性。错误的再现将导致马华主体在马来文场域中失去主体性。于是，翻译和双语（兼语）写作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得以把主流马华意识（或庄华兴所认同的马华主体）再现于马来文场域。

庄华兴不仅在论述层面努力巩固其马华主体，在译介实践上也是如此。庄华兴曾与曾荣盛编译《问候马来西亚》（Salam Malaysia）诗集，该诗集以马华的爱

⁶⁷ 庄华兴（编译），《国家文学》，页 19。

⁶⁸ 庄华兴（编译），〈马译华文文学：文化主体认知的解读〉，《人文杂志》，第 11 月号（2001），页 108-116。

⁶⁹ 庄华兴（编译），《国家文学》，页 146。粗体为引者强调。

国主义与在地认同为主旋律，收录 10 位代表性马华诗人合共 95 首诗歌，作品选自独立年代至 80 年代末。据编者庄华兴的〈前言〉，此书收录了各时代作家，反映了这段期间马华现代主义和写实主义的作品⁷⁰。然而，纵观全书却不见几位极为重要、不可忽略的现代诗代表，如温任平、温瑞安、方娥真。庄华兴在〈前言〉叙述这段期间的马华诗歌诗的不同流派，包括写实主义的吴天才、吴岸；现代派的方昂、傅承得、梅淑贞、辛金顺、游川；其他如写实兼写意的源流等。唯独在谈到现代主义时略过中国性现代主义的天狼星诗社与神州诗社。对于马华现代诗，庄华兴有自己一套见解：

但是，必须强调的是，马华现代诗并不只是对西方哲学与创作经验的模仿，而是融合了西方-中华-马华的传统，一个本土性的美学。

Namun, perlu ditegaskan bahawa sajak moden Mahua tidak bulat-bulat menimba pengalaman daripada falsafah dan kepengarangan Barat, tetapi adalah hasil perbauran antara tradisi Barat-Tionghoa-Mahua, satu bentuk estetika yang bersifat tempatan.⁷¹

学界一般认为，马华诗歌的中国性现代主义曾出现两次，一次是七〇年代中期的天狼星诗社，另一次则是 80 年代末马华诗人把大量中国文化符号写进诗歌。两者虽然都展示了中国情意结，但是前者的文化乡愁是个乌托邦，神州诗社更演变至极致。80 年代的中国性现代主义则渗入华社政治困境所形成的集体忧患意识⁷²。因此，庄华兴的序文虽提起 Chan Foo Heng 和 Chong Kim Leong 两人编译的天狼星诗社的诗选集，并表明本身无意重复他人的工作，只是希望提供另一种更全面的马华诗歌景象（suatu scenario kepenyairan Mahua yang agak berbeza dan menyeluruh）⁷³。但，我们不得不怀疑，无论就诗选或〈前言〉，似乎都忽略了第一波中国性现代主义在马华诗歌史中重要性——原因何在？一个猜测的答案是，既然马来文场域被规定了“防卫机制”的功能，则对于译什么、如何译的问题就要有一个全盘的策略考虑。职是之故，马华文学主体若要与中国性撇清关系，就必须把占据马华诗歌史重要一页的第一波中国性现代主义轻描淡写，避免徒增枝节，惹人非议。这并不意味着庄华兴彻底弃绝现代主义或中华元素，如上

⁷⁰ Chong Fah Hing dan Chan Yong Sin, *Salam Malaysia: Antologi Terjemahan Puisi Mahua*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taka, 2006), p. xviii.

⁷¹ Chong Fah Hing dan Chan Yong Sin, *Salam Malaysia*, p. xix.

⁷² 张光达，《马华现代诗论：时代性质与文化属性》(台北：秀威，2009），页 1-37。

⁷³ Chong Fah Hing dan Chan Yong Sin, *Salam Malaysia*, p. xx.

引其对马华现代诗那段话所言，它乃是融合了“西方-中华-马华”为一体的本土性美学。我们认为，庄华兴不谈神州诸子的现代派诗歌，可能是不认同于他们的大中华情意结，因为这很容易模糊掉或遮蔽掉马华的主体性。

另外，晚近几年，庄华兴在 2017 年和 2022 年翻译出版《夜行：台马小说选译》（*Perjalanan Malam: Kumpulan Cerpen Pilihan Taiwan-Malaysia*）和《台湾诗歌十五家》（*Bunga Rampai: Kumpulan Pilihan Puisi Lima Belas Penyair Taiwan*），其中涉及了华译马来文学（如林天英和杨谦来）与马译马华（如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陈大为等）与台湾文学（余光中、夏曼蓝波安等）。如前所述，庄华兴的跨语主义的语际实践论述把马来文场域规定为“防卫机制”，据此我们可质问：他之选择翻译“台湾文学”而非“马华文学”，会不会落入他对其他马华译者倾向翻译中国文学而非马华文学的批评，即“缺乏马华主体意识”？

本文认为，庄华兴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追求马华主体性的立场，原因有几点。虽然他本身并没有直接提出解释，为何马译台湾文学不会模糊掉马华文学的主体身分。但是，回到他对“防卫机制”的解释，我们可以确定，他着重的是向“客体宣告主体文化的在场”，换句话说，只要马译台湾文学不会使马华失去主体，甚至是有助厘清主体，不妨为之。其次，根据庄华兴的分析，台湾文学在马来语境中长期缺席，甚而可能不幸地被中国文学给代表了⁷⁴，这一点与马华文学的命运何其相似。因此，翻译台湾文学非但能够让马来读者了解“台湾文学”，而且也告诉他们一个真相：“华文”（Mandarin）世界不仅有中国文学，还有其他不能被中国所包括在内的文学系统，其中就有本土的马华文学和千里之外的台湾文学。

根据以上的两个规范批判以及翻译实践，大可确知，对庄华兴来说，在马来文场域中，“马华主体”一方面可能受到中国性的羁绊，导致马来读者无法区分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差异，乃至被视为不爱国、不本土，从而有碍于马华文学在国家文学中寻求被承认；另一方面，他理想中的“马华主体”也在马来文场域中与其他本土华人（Chineseness）相互竞争，为避免被后者所代表，从而加速单元主义议程与其正当性，马华知识分子有必要重夺国语，介入马来文场域。换言之，庄的跨语主义的语际实践论述，寻思的是马华主体的建立，这个主体不是形式的空洞之物。反之，它的边界之内虽然容许变化（比如母语），却也充塞了各种不变的内涵，而这就形成其马华主体论的一个特色。

⁷⁴ 庄华兴，〈绪论：迟来的台-马文学翻译〉，庄华兴、张锦忠编，《夜行：台马小说选译》（吉隆坡：三三出版社，台南市：国立台湾文学馆，2017），页 11。

然而，这也是庄华兴的主体性思考可能会引起争论之处：这个他理想中的马华文化主体，为何更优越于或更正当于其他的华人性？为何翻译马华的双重重心（巫译马华文学和中国文学）就是对“马华主体”缺乏认知，而非存在一个有别于庄华兴所追求的马华主体？又比如，为何马来文场域必须被赋予“捍卫机制”而不可视为“汲取养分”——我们不也可透过翻译来建设我们共享的、属于各族的国语文化？⁷⁵

庄华兴的规范批判所欠缺的是对正当性问题的思考。“正当性”在此相当重要，因为庄华兴对“主体”的界定并非仅仅限于形式条件，还有实质内涵。由于存在一个实质的主体，因此其他不符合此实质内涵、但却可能符合形式条件的“主体”，都可能被他视为“非主体”（他的用词：缺乏主体意识），而非“另一种主体”。由于是“非主体”，因此就缺乏正当性。问题是，他们为何缺乏正当性，这一点缺乏讨论。

追根溯底，庄华兴的“主体”并非他凭空捏造之物，而是身置于后殖民马华文化情景的历史之中。他在谈到马华文学主体的时候曾表示：

睽之马华文学研究者，最欠缺的就是对时代脉络（social context）的掌握，因而难免带着偏见对不同时代的文学进行审视。譬如谈战前马华文学，不正面处理中国左翼革命文学的作用及其逐步在地化的事实，终究无法掌握马华文学的缘起与本质，以及它对马华文化主体建构的催化作用。⁷⁶

“时代脉络”是研究者掌握马华文学的缘起与本质、马华文化主体化过程的前提条件。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时代脉络”所形成的“视野”，是否也一并内在化于他的马华“主体”认知之中？不无可能。

⁷⁵ 这一想法对于独立建国时期的华社国语运动参与者尤其如此，当时马来语是贫瘠的语文，声望也不高，却要承担“国语”功能。马华知识人要参与推动国语运动，不仅仅是要让这个语言在华社中扩散，同时也透过翻译、研究来建设国语。故此，当庄华兴把“华译马”视为“捍卫机制”而非“养分汲取”，其对国语的看法已经有别于其前行代（如杨贵谊），后者视国语为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灵魂；庄华兴固然并不敌视国语，但却对它又爱又恨。在自述语言认同时他提到：“在此地，语言习得从来就不是自然生成，而必须经历努力得之。所谓母语，或许与祖源地语言已经没有什么关系。在这草木繁茂各色人种杂处的热带地区，语言变成了异常私密化、个性化，类似仅限近亲之间流通的家族语；而父文，所谓国语，是权力的象征，也是社会通行语，但它并未难倒一个自幼与马来小孩玩闹的黄皮肤孩子，更成为他日后治学上努力开拓的疆域。从中学至职场，再到大学，他始终无法规避父文的威严，但同时也加深了他对苦难母语的关爱。他晓得，无论喜欢与否，自己传承的是父文母语的血脉。他并不晓得纯化这回事。”见庄华兴，〈回顾求学与治学之路〉，页 22。

⁷⁶ 庄华兴，〈回顾求学与治学之路〉，页 26。

从跨语主义的语际实践来看，庄华兴的“马华主体”（多语言的马华社会）的理念，的确也可在历史中找到。除了前述谈到的“八〇年代马华精神”，另一个重要思想源头则是独立建国时代的“南大精神”——事实上，这两者有着传承关系。在讨论南大生在马来文运动中的贡献时，庄华兴对廖裕芳和杨贵谊作了个案分析，在小结处肯定了南大生的马来亚新文化理念：

表面上看，廖裕芳和杨贵谊所扮演的角色相去甚远，然而他们的努力无非是朝向一个目标：追溯民族根本，在传统文化溯源之中发现民族主体与特色，进而建立杨贵谊所谓的具有多元特色的“马来亚文化”。明显地，“南大精神”在他们身上获得充分的体现，毫无疑问地，这种价值取向在培养真正的国民方面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⁷⁷

另一篇谈到南大生的论文则提到：

南洋大学作为海外唯一的华文文化象征符号，自然无法置外于客观社会与政治因素的影响。在当时以民族主义建国的要求压力下，南大马来语文推动者首先意识到问题之棘手。他们既不愿看到一个即将诞生的新祖国以单一族群为尊，也不愿永远背负古老大中国之历史包袱，乃有建立马来亚文化，即一个涵盖本土各民族文化的新文化形态之呼吁。⁷⁸

无论庄华兴的“马华主体”是否直接受启发于南大精神，可以确定的是，其“马华主体”跟南大生的“新文化构想”有若干相似之处——当中可能存在一些差异，比如对早年南大生来说，把马来文场域视为“捍卫机制”的意义是不明确的——这包括清算与老中国的历史债务、建立一个多元的马来（西）亚文化，马华主体身在其中。在这个意义上，庄华兴的跨语主义就是一种实践的方法，用以为历史中曾经存在的马华主体（南大精神、80年代华人精神）追求政治上的承认，一种对国家提出普遍地承认差异文化的要求。

⁷⁷ 庄华兴，〈南大学人与马来语文发展：廖裕芳和杨贵谊的贡献〉，载李业霖编，《南洋大学史论集》（八打灵再也：马来西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004），页250。

⁷⁸ 庄华兴，〈殖民主义、新文化、民族国家：马来（西）亚华裔作家与现代马来语文与文学〉，载文平强（编），《马来西亚华人与国族建构：从独立前到独立后五十年》（下册）（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10），页577。（粗体为引者强调）。

四、结语

本文聚焦庄华兴对马华文学“主体性”的论述和追寻，初步尝试分析他如何通过“左翼马华”和“翻译马华”这两个面向来思考主体性。本文尚未能明确定义主体性，但大致可归纳出主体焦虑的形成必然是对客体或外在于主体的某种权力/状态/现象的回应。庄华兴追求理想中的马华主体有几个特色，一是以跨界（跨境、跨语、跨族群）为方法，二是以民族性为依归，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当中，“左翼马华”作为支撑马华文学主体的精神基调，在历史上对帝国殖民主义、冷战地缘政治、国家主义等皆有积极甚至激进的批判性和思想性响应，唯在战后因各种原因未能被彰显和继承。或许可以说，庄华兴透过“左翼马华”论述是在寻找逝去的左翼历史思想资源，一种分析和批判的思想工具，也是寻找一个逐渐消逝的主体。另一方面，“翻译马华”则是他具体提出如何介入和解决当下马华文学面对的问题的方法，也是寻找主体性的积极实践面向。就此，“翻译马华”作为一种汲取养分与捍卫机制，是实践主体性的方法，而不只是分析现象的工具。总的来说，庄华兴的治学方法和态度彰显了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在族群、语言和文化身分归属难题上的深切关怀。由于篇幅和时间所限，本文未能论及庄华兴就马华文学/文化建制化走向的丰富论述——我们姑且称之为“建制马华”，尤其是建立本土中文学术传统的问题。这也是讨论马华文学/文化主体性不能缺少的重要面向。

【征引文献】

一、 专著

陈大为、钟怡雯、胡金伦（编），《赤道回声：马华文学读本 II》，台北：万卷楼，2004。

陈平，《我方的历史：陈平回忆录》，新加坡：Media Master，2004。

陈良，《大马华族文史正论》，吉隆坡：林连玉基金会，2011。

林开忠，《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1997。

杨贵谊，《华马文化论丛》，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14。

叶健，《华马文学的译介与交流》，吉隆坡：专业出版社，1986。

许德发，《在承认与平等之间：思想视角下的“马华问题”》，台北：时报出版，2023。

庄华兴（编译），《国家文学：宰制与回应》，吉隆坡：兴安会馆，黑风洞：大将出版社，2006。

庄华兴、张锦忠（主编），《夜行：台马小说选译》，吉隆坡：三三出版社，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17。

张光达，《马华现代诗论：时代性质与文化属性》，台北：秀威，2009。

Chong Fah Hing dan Chan Yong Sin, *Salam Malaysia: Antologi Terjemahan Puisi Mahua*.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taka, 2006.

Chong Fah Hing (Penterjemah), *Bunga Rampai: Kumpulan Pilihan Puisi Lima Belas Penyair Taiwan*. Kaohsiung: Center for the Humanitie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 Diaspora/ Modernity Research Unit, DFLL, NSYSU, 2022.

Hara, Fujio. *Malayan Chinese and China: Conversion in Identity Consciousness 1945–1957*.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3.

二、 期刊论文

吴小保，〈文化反抗国家文化：马来西亚华社民办文物馆构想的形成〉，《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第八期第二卷（2019），页 1-16。

许维贤，〈文化冷战中的“隐形宣传”：论友联出版社与《蕉风》在新马的经营（1955-1970）〉，《二十一世纪》总 193 期（2022），页 120-141。

庄华兴（编译），〈马译华文文学：文化主体认知的解读〉，《人文杂志》第 11 月号（2001），页 108-116。

庄华兴，〈落在香港、吉隆坡和纽约的雨：杨际光的离散现代性〉，《中国文学学报》，第二期（2011），页 327-340。

庄华兴，〈马华文学的疆界化与去疆界化：一个史的描述〉，《中国现代文学》第 22 期（2012），页 93-106。

庄华兴，〈语言、文体、精神基调：思考马华文学〉。《思想》28 号（2015），页 199-219。

庄华兴，〈马华本土、左翼马华：观看殖民与帝国〉，《文化研究》21 期（2015），页 243-247。

庄华兴，〈南洋时期的许杰及其思想〉，《世界文学论坛》第四期（2018），页 53-59。

庄华兴，〈鲁迅在冷战前期的马来亚与新加坡〉。《思想》39 号（2020），页 201-217。

庄华兴，〈冷战在马来与马华文学场域的介入与冲击（1950—1969）〉，《文化研究》32 期 (2021)，页 47-72。

Anwar Ridhwan, “Proses Memahami Pengucapan Sastera dalam Konteks Sastera Kebangsaan”, *Dewan Sastera*, (Februari 1989), pp. 54-55.

Jeremy Taylor, “‘Not a Particularly Happy Expression’: ‘Malayanization’ and the China Threat in Britain’s Late-Colonial Southeast Asian Territor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8: 4)(2019), pp. 789-808.

Seng Guo-Quan, “Revolutionary Cosmopolitanism and Its Limit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Medan and Jakarta Compared (1945-1949),”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16.1(2020): 1-30.

三、专章

查尔斯·泰勒，董之林、陈燕谷译，〈承认的政治〉，载汪晖、陈燕谷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页 290-337。

林春美，〈〈蕉风〉与非左翼的马华文学〉。台北：时报出版；张锦忠、黄锦树、李树枝（编），《冷战、本土化与现代性：〈蕉风〉研究论文集》，高雄：国立中山大学人文研究中心，离散/现代性研究室，2022，页 71-96。

庄华兴，〈南大学人与马来语文发展：廖裕芳和杨贵谊的贡献〉，载李业霖编，《南洋大学史论集》，八打灵再也：马来西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004，页239-268。

庄华兴，〈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主体（性）论述的开展及其本质〉，载朱文斌（编）：《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第二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页15-32。

庄华兴，〈边陲地带〉，载张永修、林春美（编）《我的文学路》，吉隆坡：嘉阳，2005，页175-180。

庄华兴，〈双殖民主义下的马华（民族）文学〉，载龚显宗、王仪君、杨雅慧（编）《移民、国家与族群》，高雄：中山大学人社科学研究中心，2010，页171-192。

庄华兴，〈殖民主义、新文化、民族国家：马来（西）亚华裔作家与现代马来语文与文学〉，载文平强（编），《马来西亚华人与国族建构：从独立前到独立后五十年》（下册），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10，页563-584。

庄华兴，〈马来西亚华校与马华左翼文运：以加影华侨学校为案例〉，载徐秀慧、吴彩娥（编），《从近现代到后冷战：亚洲的政治记忆与历史叙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里仁书局，2011，页417-437。

庄华兴，〈回顾求学与治学之路〉，载许德发（编），《问学札记：二十二位青年学术人的自述》，吉隆坡：燧人氏事业，2012，页21-28。

庄华兴，〈饥饿的历史巨兽：从金枝芒的长篇抗英战地小说说起（初稿）〉，载21世纪出版社编辑部（编），《十年（第十三集至第十四集）——抗英战斗故事辑（五）》，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2013，页247-261

庄华兴，〈未完的翻译，未尽的思考（后记）〉，载氏（编译），《西昆山月：马来新诗选》，加影：貘出版社，2016，页323-332。

庄华兴，〈帝国—殖民时期在东北亚与东南亚之间的文艺流动：以戴隐郎为例〉，载张晓威、张锦忠（编），《华语语系与南洋书写：台湾与星马华文文学及文化论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18，页151-178。

庄华兴，〈从失踪到隐匿：以郁达夫和金枝芒为例探讨马华文学的存在之义〉，载21世纪出版社编辑部（编），《缅怀马新文坛前辈金枝芒》，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2018，页17-36

张集强，〈华人贡献的实证：大马华人文化遗产保存概况〉，载文平强、许德发（编），《勤俭兴邦：马来西亚华人的贡献》，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9，页415-443。

四、 网络资料

庄华兴，〈遥想五、六十年代新马鲁迅潮〉，《当大大马》（2013年7月8日）

<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35035>。

庄华兴，〈黄润岳在（后）大分裂时代的家国想象〉，《当大大马》（2013年11月14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46566>。

庄华兴，〈胡愈之的流亡与左翼理想主义〉，《当大大马》（2014年10月8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76861>。

庄华兴，〈战后马华（民国）文学遗址再勘察〉，《当大大马》（2015年6月2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300401>。

庄华兴，〈现实主义写作仍有可为——兼谈流军长篇《林海风涛》〉，《当大大马》（2016年1月29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328734>。

庄华兴，〈冷战年代与鲁迅纪念的两面性〉，《当大大马》（2016年8月1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350731>。

庄华兴，〈陈映真与马华（民族）文学〉，《当大大马》（2017年7月1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384203>。

庄华兴，〈冷战前期的新马华文禁书情况〉，《当大大马》（2018年11月14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451815>。

庄华兴，〈从“马共书写”想起的若干问题〉，《当代评论》（2018年11月30日），<https://contemporary-review.com.my/2018/11/30/1-127/>。

庄华兴，〈紧急状态时期的驱逐出境法令〉，《当大大马》（2019年5月20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476789>。

庄华兴，〈鲁迅青年周金海：从执刻刀到执笔〉，《当大大马》（2019年1月12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459906>。

庄华兴，〈冷战时期的民众图书馆〉，《当代评论》（2019年12月17日），<http://contemporary-review.com.my/2019/12/17/1-226/>。

庄华兴，〈五〇年代南渡的香港第三势力文人〉，《当大大马》（2021年6月4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577626>。

庄华兴，〈存而不在的马华左翼作家——金枝芒〉，《当代评论》（2021年10月9日），<http://contemporary-review.com.my/2021/10/09/1-401/>。

庄华兴，〈黄尊生、世界语与无政府主义〉，《当代评论》（2024年3月8日）：[https://contemporary-review.com.my/2024/03/08/1-576/。](https://contemporary-review.com.my/2024/03/08/1-576/)

吴小保，〈国家文化与最后的马来亚人——八〇年代《文道》多元文化论争〉，《当代评论》（2021年12月19日），[https://contemporary-review.com.my/2021/12/19/1-416/。](https://contemporary-review.com.my/2021/12/19/1-416/)

五、其他

陈育青，〈华巫文学的译介与交流〉，《南洋商报》（1984年3月11日），版面不详。

庄华兴，〈马华左翼文学场的初步考察（初稿）〉，发表于“2012年延安文艺国际学术研讨会”（西安：陕西师范大学主办，2012年5月16-17日）。

Goh Hin San, *Sumbangan Keturunan Tionghua Malaysia dan Singapura Terhadap Bahasa dan Sastera Melayu*, Bahagian Tugas untuk Peperiksaan Tamatan pada Jabatan Pengajian Melayu Foon Yew (unpublished 1978).